

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

张云樵 孙金花

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，是两国文化由间接向直接交流的过渡时期，为以后隋唐时期两国文化的大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因此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。

一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往来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，从宏观分析，大体上可分为魏晋与南北朝两个阶段，兹分述于下：

1. 魏晋时期双方的交往 总观中国古代文化东渐大势，是以朝鲜半岛为桥梁，向日本列岛间接传播的。追溯东汉末年，公孙度割据辽东，至其子公孙康时，势力伸张到朝鲜半岛南部，设置了带方郡（黄海道南部、京畿道全部和忠清北道的北部）。公元238年曹魏灭公孙氏政权后，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南部。这时，日本北九州的女王国听到魏国的盛名，便派人去朝鲜半岛南部通过带方郡的地方长吏与魏通好。依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倭人传》记载，将双方往来情况，按次序分述于下：

据《三国志·魏书》中之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载：魏明帝景初二年（公元238年），倭女王卑弥呼遣难升米、都上牛利等出魏国，由魏带方太守刘夏派官员护送到都城洛阳，奉献男正口四人，女正口六人，班布二匹二丈。魏明帝对此深为嘉许，乃下诏报倭女王曰：“今以汝为亲魏倭王，假金印紫授，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。其绥抚种人，勉为孝顺。汝来使难生米、牛利涉远，道路勤劳，今以难生米为率善中郎将，牛利为率善校尉，假银印青绶，引见劳赐遣还。”^①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、绛地绉栗罽十张、縞绛五十四匹、紺青五十四匹，答汝所献贡直。又特赐汝紺地句文锦三匹、细班华罽五张、白绢五十四匹、金八两、五尺刀两口。铜镜百枚、真珠、铅丹各五十斤，皆装封付难升米、牛利还到录受。悉可以示汝国人，使知国家哀汝，故郑重赐汝好物也。”^②这是倭女王首次派使者来魏国。

魏国于“正始元年（公元240年），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儁等奉诏诣倭国，拜假倭王，并赉诏赐金、帛、锦、刀、镜、采物，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。”^③这是魏国于倭女王遣使通好之后，首次派使者到达倭国。

魏正始四年（公元244年），“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、掖邪狗等八人，上献生口、倭锦、绛青縑、绵衣、帛布、丹、木、狝、短弓矢。”^④魏封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。这是倭女王国第二次派遣的通魏使者。

魏正始六年，魏赐难升米“黄幢”，“付郡假授。正始八年，王颇为带方太守到任

以后，正值“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王卑弥弓素不和，遣倭载斯、乌越等诣郡说攻击状。”^⑤日本列岛上的卑弥呼国王与卑弥弓国王发生武装冲突，并将这一情况派使者报告给魏国，倭女王国第三次向魏国派遣使者。

魏正始八年，魏国为了调解卑弥呼与卑弥弓之间的不和，不使兵戎相见，派遣塞曹掾史张政，送去魏国给难升米的“黄幢”，携带魏国皇帝的诏书，发布檄文，劝喻双方不要争斗。这是魏国第二次向日本列岛遣使通好。

不久，倭女王卑弥呼死。始立男王，引起国内不和，遂改立卑弥呼宗女年仅十三岁的壹与为王。壹与遣掖邪狗等20人送还魏使，并“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，贡白珠五千，孔青大句珠二枚，异文杂锦二十四匹。”^⑥这是倭国第四次向魏国派遣使者。

由此可见三国时期的中日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。

这一时期中国文献的记载，如“亲魏倭王金印”，其印样收存于日本的《好古录》中。还有大版府和泉市黄金塚古墓曾发现有魏景初三年铭文的铜镜，恰与《三国志·魏书·东夷传》记载的魏赐卑弥呼铜镜百枚相符。

西晋时，中日官方往来见于文献记载的共有两次。一次是《晋书·四夷传》记载：“泰始（晋武帝年号，公元265—274年）初，遣使重译入贡。”说明倭女王国与中国往来一直继续到西晋。此后，因中国、日本列岛、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风云变幻，剧烈动荡。中国内部发生了空前的大动乱。朝鲜半岛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鼎立纷争，阻隔中日往来的通道。日本列岛大和朝廷的兴起，倭国被其统辖等多种因素。所以约有150百五十年左右在中国史籍中不见中日往来的记载。第二次往来是在东晋末年安帝（公元397—418年）时，又“有倭王赞遣使朝贡。”^⑦的记载。

2. 南北朝时期双方信史往来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，这个时期的中日往来，主要是和南朝交往密切。在南朝的宋国，从高祖永初二年（公元421年）至顺帝升明二年（公元478年）期间，在日本相当于仁德天皇至雄略天皇的时候，两国通使竟至八次之多。情况如下：

第一次，据《宋书·蛮夷传》载：“倭国在高丽东南大海中，世修贡职。高祖永初二年，诏曰：“倭赞万里修贡，远诚宜甄，可赐除授。”^⑧这则史料系指南朝宋高祖刘裕永初二年时，日本大和朝廷仁德天皇（中国史书称倭赞），曾派使者来到宋国。

第二次，据《宋书·蛮夷传》载：“文帝元嘉二年（公元425年），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。”^⑨这在《南史》中也有同样记载。

第三次，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载：“元嘉七年（公元430年），倭国遣使献方物。”^⑩

第四次，在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中有“元嘉十五年，是时……倭国、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。”^⑪按此时正值日本仁德天皇（赞）死，皇子珍继位。据《南史·夷貊传》称：“赞死，弟珍立，遣使朝贡，自称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，表求除正。诏除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珍又求除正洧等13人为平西、征虏、冠军、辅国将军等号，诏并听之。”^⑫笔者推测《南史》中所记“弟珍立”，可能是“子珍立”之误。

第五次，在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中有：“是岁（元嘉二十年）……百济国、倭国并

遣使献方物。”^⑭《宋书·蛮夷传》载：文帝元嘉“二十年，倭国王济遣使奉献，复以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”^⑮此时正是日本允恭天皇（公元412—453年）在位，所以《宋书·蛮夷传》中所说倭济，当指允恭天皇。

第六次，据《南史·夷貊传》载：元嘉“二十八年，加使持节，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，安东将军如故。”^⑯在《宋书·文帝本纪》也有元嘉二十八年，“秋七月甲辰，安东将军倭王济进号安东大将军。”^⑰

第七次，《南史·夷貊传》载：“济死，世子兴遣使贡献。孝武大明六年，诏授兴安东将军倭国王。”对比《宋书·孝武帝本纪》中有大明四年十二月乙未，“倭国遣使献方物。”^⑱的记载。从这两则史料所记，世子兴遣使的时间应是孝武帝大明四年（公元四五三年）末，日本应是安康天皇在位，世子兴应指安康天皇。

第八次，是兴死，弟武立，自称使持节，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七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。顺帝升明二年（公元478年），遣使上表。诏除武使持节，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，安东大将军倭王。”^⑲另据《南史》所载与此略同，故不重述。

南朝刘宋灭亡后，萧齐政权建立。据《南齐书·东南夷传》载：“建元元年（齐高帝年号，公元479年），进新除使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王武号镇东大将军。”^⑳宋亡以后，日本与齐仍有外交往来。

梁代齐以后，据《南史·夷貊传》载：“梁武帝即位，进武号征东大将军。”^㉑对此，《梁书·东夷传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均有记载。

总之，南北朝时期，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，中日新航线的开辟，中日双方的交往比魏晋时期更为密切了。

二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

1. 文字与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 在汉字传入日本以前，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。故有日本“无文字，以刻木、结绳记事”，^㉒到目前，除了汉字，没有发现那时有其它类似文字的东西，可以说日本最早的文字就是汉字。汉字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尚难论定。相传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（公元284年，晋武帝太康五年），阿直岐自百济东渡日本，担任皇子稚郎子的教师传去的。阿直岐推荐王仁，次年王仁至，进《论语》十卷，《千字文》一卷。皇子师之而通其学。一般以为日本学习汉文始于此时。笔者认为，早在西晋以前，中日民间与官方早有交往，由于多种原因，使大批秦人、汉人从朝鲜半岛移民日本列岛，即日本所称的归化人。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，不断地移居日本，数量是相当大的。据日本学者栗田宽统计，他从日本古代史书中出现的两千多个姓氏里，其中有七百多个是“归化人”的姓氏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。“归化人”中，中国人占绝大多数。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汉字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。他们教给日本人学习汉字，使用汉文，后来就逐渐把汉字做为日本的表音文字来书写日语，并在日本社会上层人中传授儒家的书籍。据文献所记，早在倭女王卑弥呼时代，就有人能懂汉语并能写汉文了。如《魏书·倭人传》载：“正始元年，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，拜假倭王，并赉诏赐金、帛、锦、采物，倭国王因使上表答谢诏。”^㉓

又“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素不和，遣倭载斯、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。”^②当时在日本列岛上，不但有大批“归化人”通晓汉文，就是本土也有一部分人懂汉语、识汉字和用汉文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日交往的加强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益加深。到南北朝时，日本使用汉语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在《宋书·蛮夷传》中，有宋顺帝升明二年（公元473年）倭王武给宋国的表文，兹录于下：

封国偏远，作藩于外，自昔祖弥，躬怀甲冑，跋涉山川，不遑宁处。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，渡平海北九十五国。王道融泰，廓土遐畿。累叶朝宗，不愆于岁。臣虽下愚，忝胤先绪，驱率所统，归崇天极。道径百济，装治船舫，而句骊无考，图欲见吞，掠抄边隶，虔刘不已，每致稽滞，以失良风。虽曰进略，或通或不。臣道亡济，实忿寇仇，壅塞天路，控弦百万，义声感激，方欲大举，奄丧父兄，使垂成功，不获一篑。居在谅闇，不动兵甲，是以偃息未捷。至今欲练甲治兵、申父兄之志。义士虎贲，文武效功，白刃交前，亦所不顾。若以帝德覆载，摧此强敌，克靖方难，无替前功。窃自假开府，仪同三司，其余咸各假授，以劝忠节。

此表文词雅伤，很有南朝风韵。虽然有人怀疑表文为《宋书》编撰者沈约改动、修润过，但不是伪造的。汉文传入日本，在上层人士中日益普及，为隋唐时代日本人充分运用汉文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。

在汉文字在日本流传的同时，儒家经典也相继传入日本。同时，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与变化，原先居住在乐浪与带方的中国人，陆续大批移居日本。据文献记载，到达日本的有弓月居率领的秦人，有阿知使主和他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，以及后来从百济到日本的汉人，有陶部高贵、鞍部坚贵、画部因斯罗我等大批“归化人”。他们带来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。除儒家学说以外，道家思想、阴阳五行以及谶纬之学也相继在日本广为流传。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，做为外来的精神营养，丰富了日本民族的思想内容，对日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对日本隋唐时期的思想开放铺平了道路。

2. 佛教的传入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。中国的佛教传播，由黄河上下，大江南北，流传到辽东和朝鲜半岛，又从朝鲜移民到日本的汉人把佛教带到日本，在日本列岛流传起来。如在日本的汉人后裔司马达笃信佛教，在日本结庵奉佛。他的女儿是日本的第一个尼姑。从百济陆续传入各种佛学经卷和释迦佛铜像，日本笃信佛教的人，从上层到民众信奉者与日俱增。从此，日本与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格外深厚，为日本的佛教大盛创造了条件。以后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中，僧侣的人数比重是很大的。

3. 中国的养蚕、纺织和缝纫技术传入日本 日本列岛似乎很早已知养蚕。据《魏志·倭人传》载：“种禾稻、紵麻、养蚕、缉绩。”说明倭女王卑弥呼时代已经养蚕，但养蚕与抽茧成丝的方法极为简陋，“口里含蚕得抽丝”，把茧一个一个含在口中抽出丝来，产量少，质量低。可是由于中国人的到来，日本列岛的养蚕和纺织业才有显著发展。

据《姓氏录》载，仁德天皇时，把从朝鲜半岛移居来的秦人分置各部，从事养蚕织绸。他们所献的丝织品非常精美。至雄略天皇时，把分散居住的秦人等92部，18,670人，令其从事养蚕织绸。不久，他们所织的绢缣，朝廷上堆积如山，因赐姓太秦公。后

来雄略天皇又把秦人等分置于适于养殖桑蚕的各国县。^②日本又带回汉织、吴织，即中国的机织工，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，结果使日本的养蚕业、纺织业得到空前的发展。由于日本仁德朝以后，与中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，尤其在雄略朝时，由于汉织、吴织、兄媛、弟媛的移入，深受中国南朝文化的刺激，于是天皇产生要在日本实现中国所说的“衣冠之邦”。诸如命小子部螺赢收集国内的蚕，^③使后妃亲自养蚕，或敕令百济招徕带方郡内技艺卓越的中国人，^④或招集为臣连等所驱使的秦人等，^⑤责令从事养蚕纺织之事。甚至在雄略天皇临终遗诏中仍在表示遗憾！其在遗诏中说：

“不谓遘疾弥留，至于大渐，此乃人生常分，何足言及。但朝野衣冠，未得鲜丽，教化政刑，犹未尽善，兴言念此，唯以留恨。”^⑥

由此可见，雄略天皇对“朝野衣冠未得鲜丽”，大有死不瞑目之恨。由于日本历朝的重视和提倡结果，使日本的养蚕业、纺织业得到空前的发展。

倭女王卑弥呼时的衣著，据《魏书·倭人传》所记：“男子皆露衿，以木绵招头。其衣横幅，但结束相连，略无缝。妇人被发屈衿，作衣如单被，穿其夹，贯头衣之。”^⑦即男人穿的是把整幅布处处用线缝连起来的衣服；女人穿的是在一块布中间开一个口，从那个口把头伸出来的一种衣服。所用衣布也只是些用麻、楮、谷等植物纤维织的极粗糙的东西。自从魏与倭有往来以后，看到中国人的衣著，从中国传来户衣料和先进的服装式样，使日本朝野人士眼界一新，向往中国的丝织品、毛织品、衣装、衣料等，于是促进了日本的服装改革。日本又从朝鲜半岛南部把兄媛、弟媛等中国纺织工带到本国，仿照中国服式改进日本的服装，使之样式美观，穿着舒适。

3. 中国科技、工艺和艺术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人移居日本列岛，带来先进的科技文化，促进了日本科技进步与文化的提高。

采用中国制造铁器的新技术，如打制锋利的武器，制造铠甲时使用的铆钉等。又如生产工具的制造也有显著改进，锹、锄、犁铧，由长方形改为“U”字形，提高了耕作效率。此外，镰刀、锯、凿、斧等金属工具，均向中国学习加以改进。

从第五世纪中期开始，日本从中国传入烧制坚固陶器的方法。在《日本书纪》中首次见到陶部的名称，这在日本制陶技术发展上很值得重视的。据考古学者说，从日本古坟中发掘的陶器有两类，一种呈红褐色，质地较软，一件是灰色，质地坚硬。前者从石器时代延续而来，后来是陶部移居日本后带来的。用后者烧制出来的陶器称“须惠陶器”，它逐渐取代了“弥生陶器”。这种制陶技术，首先改用了有一个长10米左右，有一定倾斜度的所谓“升窑”，由下端点火，从上边出烟，温度可达一千年以上，因而烧出的陶器质地坚固，色泽美观。其次是用“辘轳”来调和粘土，代替两手搓揉，从而提高了工效。从目前古坟发掘的数量来看，陶器出土较多，这说明陶部移居日本后，用先进技术生产的陶器，需要量大，使制陶业兴旺起来。

据《日本书纪》所记，雄略天皇时，在大批所谓的归化人中，有精通各种工艺的手艺人。这些人多才多艺，几乎带来全部的中国工艺技术。由中国传来的镀金与制造玻璃器皿的精巧工艺。如仿制中国的铜镜，已在很多古墓出土。又能用金和铜制造十分精美的马具。如果没有金工、木工、漆工、制革工以及各种工艺的综合协作，是制作不出来的。新工艺的应用，使日本的工艺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。

日本在建筑与绘画方面也颇受中国的影响，在移居日本的汉人中有画部。这就是绘画技术的移民，对日本的艺术发展有密切关系。如日本法隆寺堂塔的全部样式，是经由百济输入日本的南朝流派的产物。再有法隆寺建筑中所用的云形肘木，是由中国传来的南朝兴起的佛教艺术。在法隆寺内所藏的天寿图曼陀罗丝绒残片上绘有比丘敲钟、天女飞翔、玉兔捣药、莲花坐佛各部分。其绘画的韵味笔致，都与南北朝时期的画风十分近似。再有北州福冈县的一些古墓，如王家古墓、竹原古墓等，在墓室石壁上画有装饰壁画，都深受中国的影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，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尽管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、思想文化各不相同，可是文化不是封闭的，其流向是从高处向低处，从比较充实向相对空虚，从先进到落后的地方流动不已。中国文化较日本先进，所以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较大。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中的先进东西，确实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社会变革和文明开放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- ①②③④⑤⑥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三十《乌桓鲜卑东夷传》。⑦《南史》卷七九，第一九七四页。⑧⑨⑩《宋书》卷九七。⑪⑫⑬⑭⑮《宋书》卷五、六。⑯⑰《南史》卷九七。⑱《南齐书·东南夷传》⑳《梁书·东夷传》。㉑㉒㉓㉔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三十，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。㉕《神代纪》的一书中说：“口里含蚕得抽丝”。㉖《雄略纪》。㉗《雄略纪》六年三月条。㉘《雄略纪》七年条。㉙《雄略纪》十五年条。㉚㉛《日资书记》。

〔本文作者：张云樵 吉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，孙金花 讲师〕

【本文责任编辑：卞直甫】

金代文学保存整理概观（二）

周惠泉

《拙轩集》

《拙轩集》，王寂撰。王寂（1128—1194）系金代中期文学家，字元老，蓟州玉田（今河北玉田）人，天德三年（1151年）登进士第，任为太原祁县令、通州刺史、中都副留守、中都路转运使等职，谥文肃，著有《拙轩集》、《鸭江行部志》、《辽东行部志》。《拙轩集》原本久佚，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，釐为六卷以行世。集中包括赋、诗、词、表、牒、记、序、帖启、书后、祭文、行状、墓铭、哀辞等各类作品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诗词和古文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于《拙轩集》一书虽然作了介绍，但是其中亦有疏误之处。比如提要称寂“登天德二年（1150年）进士”，就是不正确的。检《拙轩集》卷二“忆昔登科正妙年”一诗，诗题中有“天德辛未，家君守官白霄，仆是岁登上第”之语，“天德辛未”即天德三年（1151年），则提要所谓“天德二年”实为天德三年之误。今存《拙轩集》，系清人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，有光绪间吴重熹《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》本，今复按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发现馆臣漏辑者尚有二诗，特补载于后：高村马上口占，村上桑柘绿成围，蚕傍三眠麦掉旗。为问农家真乐否，不妨说与长客知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三千五百七十九“村”字韵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五十册。）过麻棘铺，不觉欣然似有西归之兴，马上戏成一诗，他时当以麻棘部落错欢喜铺：路入辽西马欲飞，山川村落尚依稀。行人辄莫错欢喜，此度西来未是归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四千五百七十六“铺”字韵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五三册。）